

澳門中葡對話五人物*

安文哲**

我們現在介紹的一組五位人物——弗朗西斯科·隆迪納、施利化醫生、高若瑟、白樂賈和若澤·多斯·桑托斯·費雷拉在澳門這個真正文化多元、有著不同的價值與認同的社會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

他們是葡萄牙域外精英階層智力、道德和科學高品質的象徵人物，同樣也受益於豐富的中國文化精神。外國人和澳門葡萄牙人置身於這樣的一種有增益和發展了的持久戰略夥伴關係之中。

在不同的領域內，他們奮鬥了一生（如教育、哲學、傳教、醫學研究、詩歌、植物學、澳門歷史、語言學、中國歷史、偶在政治和公共管理），為塑造澳門的社會、精神和文化面貌作出了貢獻。他們遵循一種拉丁民族特有的思維模式的價值。

他們極大程度地呼籲葡萄牙和中國，就時間和歷史帶給澳門的重大與結構上的差異，進行理性的對話。每一個人，以其不同的方式，創造了一條對話與諒解的道路。

一、弗朗西斯科·隆迪納

弗朗西斯科·隆迪納（1827-1897），為葡萄牙東方王家保教權服務的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為澳門的葡萄牙文化、教育和哲學教學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作為坎波利得公學的哲學教員，他在葡萄牙呆了約兩年時間。他將新托馬斯主義引入了葡萄牙，而這一哲學流派於1879年，在教皇利奧十三世的通諭“永恆父之獨子”公佈後，才正式肇始。

* 僅以本文紀念澳門歷史學家文德泉蒙席誕辰100週年，1912-2012。

** 教員、研究員及數部澳門歷史作品的作者。

1862年1月前來澳門領導聖若瑟修院。當時它正處於一可怕的衰退中，學生匱乏志趣。同年三月底抵達澳門。這是一個特殊的年份。龐巴爾侯爵下令驅逐耶穌會士百年之後，他們回歸澳門。法律是1759年制定的，但要到1762年才在澳門執行。在葡萄牙，國王唐路易斯登基。

後來弗朗西斯科·隆迪納在《印度與中國遊記：植物、動物、習俗和奇遇》（1884年）一書記下了這次難忘的旅行。其第二卷描述了“從廣州到澳門”的路途。此書內有大量令人好奇、引人入勝和筆鋒犀利的信息。這是一個巨大的信息源泉，可它還未被歸在葡萄牙東方學的範疇內，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在前市政廳古書庫中所藏的那冊上，見有一印章：“諾拉斯科家族贈”，但它原來的書主在扉頁中留下了名字：“曼努埃爾·J·達·席爾瓦，1885年1月16日於澳門”。

文德泉蒙席回憶到，聖若瑟修院的教師弗朗西斯科·隆迪納（教授修辭、哲學、理性哲學和道德哲學、教義神學），若澤·馬托斯（教授法、葡萄牙語、文學），法利亞（教授葡萄牙語和拉丁語語法），若澤·馬克斯（教授漢語），安東尼奧·洛佩斯（教授拉丁語和葡萄牙語）和托馬斯·卡伊爾（教授英語）形成了一個小小的教育精英團體。聖若瑟修院恢復了往日的威信。幾年後，它已經有了約四百餘名學生。

學生之一叫曼努埃爾·戈麥斯·達·科斯塔。就是後來指揮了1926年5月28日革命的將軍和元帥。它標誌著共和政權無政府狀態和動盪的結束。

弗朗西斯科·隆迪納博才多學。他用自己的知識和文化為社區服務。他堅定地崇拜賈梅士、安東尼奧·維耶拉神父、門德斯·萊亞爾、亞歷山大·艾爾庫拉諾、安東尼奧·費利西亞諾·德·卡斯迪略、拉迪諾·科埃略等人。弗朗西斯科·隆迪納發表了以下著作：《回顧我主耶穌基督的神聖性來回應歐內斯特·勒南》（1864年）、《聖若瑟修院報告之審查》（1868年）、《致上川島沙勿略古墓朝聖者》（1869年）、《庇護九世與革命》（1871年）、《教育論》（1887年）、《自然哲學與理性哲學》（1888年）。還有以他的母語意大利語發表的著作。

作為哲學教員，他的工作很出色。他編輯出版了《葡萄牙在華青年用理論與實踐哲學課本》。它是在澳門聖若瑟修院印刷所印製的。

它遠遠不僅僅是一本教科書。1869年，第一冊問世，1870年印行了第二冊。內容目錄如下：邏輯學、小邏輯〔或辯證邏輯、大邏輯（辯證或批判邏輯）〕、一般形而上學（或稱本體論）、特殊形而上學、宇宙學、心理學、自然神學（或稱神義論）、道德哲學（或稱倫理）、社會哲學及宗教哲學。

《濠鏡叢報》的編輯在1897年5月30日刊號上解釋說，這部作品是“由我們的朋友佩德羅·諾拉斯科·達·席爾瓦先生已故的父親出資刊印的”。冥冥之中，一隻無形的大手在推動一切。

他的目的很雄偉：促成“哲學家”的出現。“我們的願望是開辦一個為期三年的哲學課程。課程的第一年專授邏輯和形而上學，第二年講授倫理和自然法，第三年介紹哲學體系或宗教哲學。”但這一設想未得以實現，因為澳門是“一個致力於商業，遠離文明中心，沒有圖書館的地方。”

重要的開拓提出問題的新空間。他是這樣看待傳教團的教學意義的需求的：“我們為澳門和其他中國口岸的葡萄牙青年編寫一本課本是鑒於那裡沒有高等教育。對我們而言，有必要將這裡不傳授的其他學科的成份囊括在本書中。它們不違背哲學，相反，是哲學的一部分，如同法學、政治經濟學和宗教哲學被列入哲學的範疇那樣。”

托馬斯主義貫穿於整部著作。“本課本中包括的所有理論的基礎是聖托馬斯在《神學和哲學簡要》中闡述的哲學。可以歸納為兩位著名的哲學家古丹和利貝拉托爾。”這是因為“現代哲學偏離了基督教為它設立的路徑，逐步時而依靠使人類愚笨的唯物主義，時而附和於使人神聖的理性主義。在這兩個勢不兩立的體系之間漂浮不定。”

因此，“哲學對在一個充滿幻覺和瘋狂的時代被遺棄良好原則的回歸，構成了一種理性科學的真正進步，預示著社會的一個美好未來。

《濠鏡叢報》的編輯記錄下了弗朗西斯科·隆迪納對他的學生們呼籲：“我親愛的孩子們——他在哲學、演說和詩歌藝術的講座中說——當得知，我的學生在完成自然和理性哲學後，要去給英國人擦鞋，僅僅從事普通職員的工作，我非常難過。你們要從事科學和文

科，而不要從事機械性的服務。你們要當律師、醫生、工程師、商人，但不要讓自己的身體和精神在抄寫員的辦公室耗盡。”

澳門需要這種氣概的人！他們有著遠高於平庸的預見和引入一種文化氛圍的能力。

然而，問題出在了最不該出的地方。在《聖若瑟修院報告之審查》中，對一場由安東尼奧·卡瓦略神父領導的反對耶穌會士的運動，進行了剖析，迫不得已說出了一些細節，“如果我們說出去了低俗而不堪入耳的事情，請讀者見諒。”正如人們經常說的那樣，互相揭短，互相指責，互相爭鬥。這些如果運用恰當，視情況而定，還是可以說得過去的和有益的。

除了這些讓一個機構炸了鍋的內部問題外，弗朗西斯科·隆迪納自然觸及了苦力貿易和奴役的主題。而這個問題，對官方而言，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涉及人員、法律與道德的問題。向秘魯和古巴的移民潮通過澳門港。這是一個盈利，但卻碰不得的問題。

一個新托馬斯主義哲學與基督教人文主義價值的倡導者怎能失聲，視若罔聞，與這樣不光彩的行徑沉瀆一氣？

這種角色引發了軒然大波與不悅。弗朗西斯科·隆迪納已成為佔主導地位的現政權的眼中釘、肉中刺了。由於不能解僱他或把他驅逐出澳門，需要乞靈於另外一種或許是從魔鬼的教誨那裏學來的辦法。

1871年，里斯本發來了一個部令，明確而有所指地規定，聖若瑟修院的全體教師必須是葡萄牙國籍人士。不符合這一要求者將被迫離開澳門。這就是所找到的解決方案！

由民政廳主席比厘喇·馬忌士領頭的澳城各種有生力量致電海事和殖民地部長，試圖撤消這一立法措施。根本未得到答覆。向總督提出了有800多人簽名的請願。他們贏得了一些時間，但情況依然故我。因在聖若瑟修院及其教員地位規定上，未得到任何諮詢，澳門主教辭去職務。

從里斯本，與眾不同的艾薩·德·克羅斯於1871年7月，經過《一場快樂的行動》的準備後，投來了一束束慷慨激昂的《利劍》：“本月

發生一場愛國主義的恐慌：有人以為，我們會失去澳門！據說，中國已勒令葡萄牙撤出這一殖民地，那裏的統治歸留著辮子的人！政府為人所痛指；里斯本商業區到處是消息；針線街的民族自尊似乎受到了深深的傷害。傳言說，卡洛斯·本托先生，就像以前的該隱，在夜深人靜的時刻，聽到了人們發出的復仇呼聲：——本托，你把澳門怎麼了？政府為了讓我們放心，通過《政府憲報》的字裏行間不斷喊道：——，葡萄牙公民，不，澳門仍然是你們的！”

另外一把火是費雷拉點的。他於1872年出版了《呼籲真相或澳門耶穌會教師問題及澳門土生的教育問題》。他捍衛弗朗西斯科·隆迪納及其同伴說到：“要團結起來，推動本地孩子適當的教育。”這番話清晰而真實。

在上海，E·科多於1873年刊行了《耶穌會士問題要求的真相》。這說明問題遠遠超出了澳門的範疇。

不公正事情還是發生了。弗朗西斯科·隆迪納和其他外國傳教士被迫離開了澳門。他們前往了巴西，後在意大利定居。在這裡，他繼續在《天主教文明》報上撰文，論述澳門、中國和葡萄牙的問題。

令人驚詫的是，這樣一位迷人和神秘的人物並未引發人們對他的生平，著作和思想的研究。

二、施利化

施利化上校（1853-1905）是澳門利宵中學的首任校長。這是1894年的事情。之前，他有著一個聲名赫赫的軍事生涯，曾在遠東的澳門和東帝汶服役。此外，在醫學研究員、植物學家和新聞記者方面卓有成績。

他出生於波爾圖。畢業於波爾圖醫學外科學校。之後走上軍事生涯。1881年，被派遣為澳門及東帝汶衛生人員二等醫生。

他在東帝汶逗留了一年半，寫下了這番話：“帝力的社會生活類似葡萄牙本土的小地方。它彌補了氣候的惡劣。無圖書館，無公會，

無劇院，無會議中心，無桌球，無樂團，無任何娛樂心靈的辦法。”我們要承認，這種生活對於一個葡萄牙人來說，不是件易事，可帝國又迫使他們以四海為家。

1884年，受澳門總督羅莎之托，主持了管理帝力市的行政委員會。很快出版了兩篇非常有趣的文章：《維克克地方卡爾達斯·德·備馬納斯簡訊》（1889年）及《澳門和東帝汶植物錄》（1887年）。還為科英布拉大學植物園提供了一套植物標本。同時也向同一城市植物學會提供了一套。

關於東帝汶情況的著作，應該提及《澳門及東帝汶衛生服務報告》（1887年）、《東帝汶衛生服務需求報告》（1889年）及《在東帝汶》（1892年）。

1888年，他擔任過派遣暹羅外交使團的秘書，並因此於1889年出版了《暹羅行》一書。

1892年，他在波爾圖水晶宮舉行的殖民地博覽會的澳門和東帝汶組織委員會工作，主持澳門和東帝汶歷史文化組。

澳門的葡萄牙人言辭懇切地要求設立澳門利宵中學。1893年9月5日的《葡屬東方》刊登了一條很有力的消息：“澳門利宵中學的設立滿足了居住在澳門的家長和青年們的最大願望。”

1894年3月24日，澳門總督高士德委任施利化醫生擔任澳門利宵中學的校長。一是因為他的博學聞名遐邇，二是因為在這種微妙的初創和組織階段，需要有創業精神和充滿活力的人來領導。不要忘記，施利化醫生當時是衛生局局長。後來還教授物理、化學和自然史。教師的薪水是800雷伊斯，校長多加60雷伊斯的獎金。

找到了用於校址的樓房，就是已經廢棄的聖奧古斯定修道院（最終還是倒塌了，幸未造成人員傷害）。需要配備教員，為此，海軍和海外國務秘書處舉行了審查文件的招考。在學年開始的響當當的教師名字中，有庇山耶（哲學）和慕拉士，還有馬特烏斯·利馬、阿布雷烏·努內斯、里貝羅·卡布拉爾、瓦斯科·佩雷拉和巴爾塔薩·法雷洛也是已經證明了具有能力和敬業的教師。8月16日，頒佈了校規並於9月10

日和11日舉行了入學考試。9月2日，舉行開學典禮。由於趕上王室喪期，儀式從簡。

學年開始了，一共是57名學生。完全可以想像到，無論是在組織方面，還是在管理贊助政策和這一成立學校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方面，施利化醫生做了不少的工作。

仔細分析來，施利化醫生三次連任校長絕非偶然（1894年至1898年，1898年至1899年，1900年至1903年）。

他繼續出版科學論文（《印度航綫和澳門麻風病院中的流行性霍亂報告》（1885年）、《用凡爾桑血清治療鼠疫論文的報告》（1897年）及《關於澳門和對面山鼠疫的報告》（1897年）。民俗社會學方面有：《澳門共和國：愉快的歷史，由一創始人，在許多工作人員和輔助人員的合作下撰寫》（1896年）。此文於1994年再版。教學方面有：《澳門教區修院學生用衛生及實踐醫學入階》（1899年）。此外，還在新聞媒體上進行了慷慨的合作。在《憲報》出版的一些論文值得回顧，因為它們是澳門和東帝汶歷史的重要來源。

1898年，他參加了發現印度海上航綫四百周年慶祝活動澳門執行委員會。1900年他參加了巴黎世界博覽會澳門館委員會。在軍事醫院中，創建了一個自然史博物館。於1906年被調往澳門利宵中學。

圍繞消滅鼠疫的預防性措施，與里卡多·豪爾赫醫生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他曾多次受勳，主要有：海外服務金質勳章、寶劍勳章、聖地亞哥軍劍勳章、阿維斯軍事勳章，還有許多次嘉獎。

作為葡萄牙北部人，他放不下紅葡萄酒。從他位於下杜羅的莊園直接進口到澳門。

1905年11月1日他逝世於澳門的宅院“白莊”。其時已經是上校醫生。

他去世時，在由文第士主持的澳門利宵中學董事會上，記錄下了第一任校長所做出的最顯著的貢獻——鞏固發展了澳門利宵中學，為

它帶來了信譽。他的私人圖書館也捐獻給了澳門利宵中學，其中主要是醫學和植物學方面的書籍。民政總署（原市政廳）歷史悠久的圖書館中老檔內保存的澳門利宵中學圖書館和大部分的醫藥書籍曾屬於施利化醫生。

以前曾經在澳門利宵中學任教的慕拉士，在一封《日本來信》中寫到：“最後，說句思念我在遠東的同事施利化醫生。他是《波爾圖商報》的通訊員。我剛剛收到信，得知了他的逝世。施利化醫生很緊張、多愁善感和喜怒無常。他的整個職業生涯在澳門，但也未逃過澳門這一殖民地對他的尖刻批評。要說批評，澳門的此種負能量是很強的。然而，今天，他那僵直的軀體安息在一個墓穴中。全澳門、所有認識過這個偉大的鬥士，為逝去了這樣一位敏銳的知識分子、傑出的作家，不知疲倦、殷勤的澳門衛生局局長而感到真正的悲痛。無疑，他是過去二十多年中，澳門最傑出的歐洲居民。”

澳門政府於1917年收購了“白莊”，將其闢為隔離天花病人的“施利化醫生室”。

他的名字留在了澳門地名中。多年來，他是葡語預備學校的主保。這間學校已蕩然無存，從澳門葡萄牙教育體系中消失了。

三、高若瑟

高若瑟（1880-1976）是亞速爾群島坎德拉里亞·德·皮克人。他是在東方和遠東旅行和工作過的最負盛名的葡萄牙人之一。

他於1902年來到澳門。當時他還是英雄港神學院的應屆畢業生。來為新任命的主教鮑理諾作秘書。他也是亞速爾人。1903年受鐸。後立即成為葡萄牙東方保教權下的傳教士。

曾任聖若瑟修院和澳門利宵中學的教員。很久以後，他回憶說，“聖若瑟修院培養了幾代神父。無論是人品，還是為教會提供的服務都是出類拔萃的。是聖若瑟修院和中學為澳門、香港、上海、廣州和中國各開放口岸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土生葡人。他們擁有良好的商業準

備、各種知識和他們根深蒂固的宗教感情為培養他們的母校增光。此種肯定是公正的。它不應該被遺忘。

以前的一位學生巴素打爾古，在《我的生平與我的時代的回憶錄》中，回憶他的葡萄牙語教員高若瑟說，他是“一個智力與道德水平崇高的人”，話語“娓娓動聽、說服力強、表達非常明確清晰、教書熱心，一絲不苟。是他首先注意到了我的作文練習的文字輕快、有章法。他以預言家般的準確，為我安排了一條作家命運之路。”

1911年，他受命牧訪海峽差會、馬六甲和新加坡差會及東帝汶差會。時逢亂世，因為共和政權顯然相當不容教會。在澳門，這種激進的思想主要是由葡萄牙海軍船隻上的水手帶來的。這是次回航的衝突。一次，高若瑟獨自一人，以大無畏的勇氣，阻止了他們入侵主教府的企圖。

他於1915年創立《東方雜誌》。這是一份短暫的出版物，出了十幾期便結束了。文第士是主要合作者之一，寫些關於中國美學的文章。

在鮑理諾主教逝世後，他被任命為澳門和東帝汶主教（1920-1940）。

1937年，他牧訪了東帝汶並就葡萄牙教育使命的基督教和人文主義視野問題向殖民地部長做了彙報：“我認為，我們所有的殖民與教育活動必須直接有益於當地人，而不是白色人種。”他繼續闡述這一想法：“我熟悉各個殖民地。據說是很發達，很進步，很豐富。這是不爭的事實。但財富集中在一些歐洲人手中，而土著居民仍生活在原始時代的簡陋和無知之中。這不是殖民，是剝削！看看那些走這條道路的殖民國家，在當今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仍然如此。”他將教育視為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我們的學校現達46所，共有2424名學生就學。如果我們有更多的師資和更多的資金，發展的步伐可以是加速的。

文德泉神父在他任社長和主編的《澳門教區月報》上發表了1938年1月第406特號，專述此次對東帝汶的牧訪。令人印象深刻地記述一切活動，包括一組寶貴的照片。這一切工作的重要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當日本人入侵東帝汶時遭到了摧毀。

他總是關注教育和學校。值得一提的是，當他在1940年離開澳門教區時，學校的數量為96所（1920年僅有47所），教師為331人（1920年僅有124人）。

他的教會生涯是輝煌的，因為高若瑟的確是一位具有罕見人文、教牧、知識和公民素質的人。

曾被任命為果阿和達曼大主教（1940-1953）、東方大主教和東印度總大主教（1940年）和克拉格摩爾的名譽大主教（1940年）。他去羅馬時的職務是敖德薩名譽大主教和教廷副攝政樞機主教。教皇約翰二十三世在1962年任命他為樞機主教。

所有這些職務，的確很排場、很風光，但絲毫未改變他的處事為人、他的愛國主義和他的基督教仁愛精神。他一生中，身體力行。若言“如我們欲成為偉人，先要讓我們變得渺小。我們要承認對上帝的絕對權力的完全依賴。我們要坦言，如果沒有他，我們什麼也不是，一事無成，一無所有。”

1964年，由市政廳提議，他被授予澳門榮譽市民稱號。1946年，他獲得殖民帝國大十字勳章。1953年，他獲得基督騎士團大十字勳章。

考慮到帝國的劇烈，但是必然的解體，而且正是始於印度，1967年，他對果阿、達曼和第烏的葡萄牙人發出了文告，額外給他們灌輸愛國主義，並保證說，那裏有葡萄牙人那裏就會有基督徒的靈性和實地根基：“在東方旅行者，每每對古老葡萄牙的回憶，大多帶有宗教色彩。果阿、達曼、第烏、馬六甲、日巴拉、望加錫和許多其他地方向我們敘述著葡萄牙人的英雄業績，我們在那裏豎起來的教堂則敘述著的我們的基督教精神。我們在印度和錫蘭、緬甸和馬來西亞、泰國和柬埔寨、中國、日本、西里伯斯和摩鹿加群島、小巽他和被稱為南印度的其他無數島嶼上播種的基督教社團眾多的後裔更是強調此點。”

自1945年以來，他是澳門“路義士葡文幼稚園”和亞速爾群島筆克島馬德琳中小學的主保。生前，他已經捐贈了他在坎德拉里亞的住宅，用來設立一個幼兒園和社工機構。

他的教義、倫理、道德、傳教士守則、歷史和傳教著作被遺忘了。其中包括出版於1947年的《致果阿總主教區神父函》。高若瑟是一位優秀的散文家、明晰的教育家、人生和人類行為的思想家。

他周游世界，見多識廣。這成為了其研究和教誨，及康德式的道義責任靈感的源泉。

上天安排出現了托馬斯·貝當古·卡多佐神父這位人物。他負責編輯了《高若瑟樞機主教文集》17卷：學生/記者、著作、中國來信、官方文件、傳教士守則、會議、旅行、在中國人和馬來人之間、致埃內斯托·費雷拉神父函、官方文件、總主教任期、致果阿總主教區神父函；致果阿輕人函、致果阿天主教徒函、羅馬來信及未刊書稿。僅差一本照片傳記。值得稱道的澳門基金會是這一宏大文化企劃的出版者。

托馬斯·貝當古·卡多佐神父策劃了“亞速爾傳教士在澳門”這一計劃。“1994年年初醞釀，適時提交給了澳門主教、英雄港主教、澳門總督、教育暨青年政務司和澳門基金會主席。否則的話，我們在東方不會逗留如此長的時間。我們於1989年12月30日抵達，從來沒有停止過為教會作牧監的貢獻，尤其是在澳門教區，為氹仔島和路環島的葡萄牙人服務。”

多虧他的工作，我們有了鮑理諾主教、若澤·瑪麗亞·費爾南德斯神父、唐若澤·阿爾維爾納、唐賈依梅·古拉特和高秉常主教著作的重印本或影印本。

2008年，在澳門國際研究所的支持下，黎祖智發表了一篇重要的研究《澳門功勳市民高若瑟》。從此文中，我摘錄一段維托里諾·內梅西奧教授最初發表於1955年11月15日英雄港《群島日報》上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話：“我們這些其他人，沒有情況和職務限制我們對這位偉人和教會的驕子，應採取的客套和恭敬。這使得我們每在談到高若瑟主教時激動不已。他是模範神父、寬宏大度的朋友、有骨氣的葡萄牙人。他是那麼的神聖和光榮，如初生子那樣平靜、無邪。他就是那樣。對這位精神領袖，我們很感興趣。在這樣一位被召以重任、作實事人的身上，保留了筆克島人的慎重。他的謙虛、正義和勇敢精神，他與生俱來的大主教的氣質是多麼的慷慨和強大：走過12公里路程

的人踏上了亞洲和歐洲的道路。每天他在走著這條路，如同每天的晨禱。他巡視學校、發現有志趣的人、監護孤兒。在此一切之上，他是一位世界公民，但他永遠是一位上帝的僕人。”

一番明智而真誠的話語。

文德泉蒙席對高若瑟主教的生活和工作崇拜得五體投地，但認為他有一個不可饒恕的欠缺：未寫下他的回憶錄！他一定有一大堆理由不寫的。

享年96歲，逝世於永恆之城——羅馬。

四、白樂賈

白樂賈（1897-1988）為葡萄牙人在澳門和遠東歷史的博學和不拘一格的研究者。他當時以“Jack Braga”署名，為葡萄牙文化和澳門做出了無數的服務。

他出生於香港。是個“身材魁梧的人，眼睛清澈明亮”。他的家庭是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肇始的先驅居民之一。其父親曾為有影響力的香港《士蔑報》的社長。白樂賈本想成為一名醫生。他的女兒瑪麗亞·布拉加回憶了這段往事：“兩行熱淚從他的臉上滑落，但再也未談及此問題。那時他只有15歲。剛剛收到了學力測驗的結果：是整個香港殖民地最優秀的學生。聖若瑟修院的修士來到他的住家，告訴他如何申請進入醫校的獎學金。他父親罷辣架回到家後，命令他不要申請，因為預計他要開始工作，補貼家庭。他畢竟是一個13名子女的家庭的長子！”。

20年代初，他的家庭返回了澳門。白樂賈進入聖若瑟修院當教師。他在此教授了土生葡人青年幾年英語、英國文學和商務英語。是他們源源不斷地補充了散居在香港、廣州、上海、曼谷、東京和橫濱經商的社團。1924年，他在澳門與奧古斯塔·伊莎貝爾·奧索里奧·達·盧斯完婚。

文德泉神父的回憶彌足珍貴：“當我於1924年抵達澳門時，他還是一個28歲的青年教師。在聖若瑟修院裡教授英語和英語文學。當時

唯一赫赫有名的歷史學家是雷吉斯·熱爾韋神父。他是我的法語教師。與白樂賈在同一所學校裏工作。但後來雷吉斯·熱爾韋神父受中國政府邀請，於1925年前往北京大學教授法國文學。白樂賈自20世紀20年起，開始對澳門歷史感興趣。改行易職，成績斐然。十餘年中，他成了本地的大歷史學家，如同雷吉斯·熱爾韋神父1916年以來的地位。他以英文出版的著作令澳門大名在外。另一位大歷史學家是徐薩斯。1902年，他的傑作《歷史上的澳門》問世，很快銷售一空。是白樂賈促成了第二版的刊行並安排了一切事宜。但在1926年，形勢突變。該書在洗衣塘（竹仔室）被當眾焚毀，作者遭法院審判。後死於窮困潦倒之中。至今仍等待著為他平反。只有白樂賈屹立不倒。”

他頻頻為媒體撰文，發表了多種關注歷史，尤其是澳門歷史的文章。有《澳門教區月報》、《里斯本地理學會會刊》、《香港葡萄牙人學會會刊》、《澳門檔案》、《復興雜誌》、《澳門消息報》、《東方文化》及《南華早報》。

他的女兒卡羅萊納·布拉加說，他的父親求知欲很強：“除了出任中國向澳門供水的公司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的經理外，他的大部分業餘時間投入到了歷史研究。同時還從事進出口貿易。“因此，他的作品題材非常廣泛，僅舉數例：《風景如畫的澳門》（1926年），《美國人在澳門及南中國》（1930年）、《澳門的早期醫療實踐》（1935年）、《謨區宣上尉的圖書館》（1938年）、《澳門印刷業之肇始》（1938年）、《澳門木刻印刷業之肇始》（1941年）、《聖保羅總會院之寶藏》（1942年）、《1513年中國登陸—歐維士抵華》（1955年）、《澳門小手冊》（1963年）、《往昔之聲》（1964年）及《香港的葡萄牙語教學》（1969年）等。

在介紹他的父親罷辣架所撰《葡萄牙人在香港與中國：他們在100年間的開始、定居與發展》（發表於《賈梅士學院院報》第十二期1978年，243頁）時，白樂賈寫了如下的一番話：“此為罷辣架之著作。這是對他的民族——在華的葡萄牙人的一個貢獻。‘我們的人’，他這樣稱呼他們的。沒有人比他更瞭解這些人潛在的價值。沒有人比他更好地可以說他們是最優秀的。沒有人比他了更熟悉自己的弱點。”可以看到，對真理含義的追求高於個人情緒或逢場作戲。

彭傑福記錄了一件對澳門社會和文化史有趣的特殊故事：“太平洋戰爭期間中，白樂賈和何東住在澳門。白樂賈告訴我，當衝突結束後，何東爵士離澳返回香港時，是他勸說何東爵士把在澳門居住的房子捐出，闢作何東圖書館。”

另一件說明其慷慨大方的事情：“學者和作家，如多才多藝的奧斯汀·科茨，使用過他的書籍和知識。許多人經常去他家，使用設在般咸道公寓裏的圖書館。他那熱情好客的妻子奧古斯塔很高興地接待所有人。”

他的藏書也值得一提。

他的私人圖書館是一座真正的寶庫，包括書籍、報紙和雜誌的彙編、手稿、地圖、信函，印刷圖片、照片和繪畫等。所有這些東西都是歷年來收集起來的。有時還同他的摯友謨區宜發生過友善的競爭。

1966年，在激進的毛主義甚囂塵上時，就是給澳門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和政治動蕩的“12.3”期間，數個國家的大學和國家圖書館競相購買這一龐大而寶貴的藏書。最終由他母親的祖國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奪魁。

這樣便誕生了《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白樂賈收藏：葡萄牙在亞洲及遠東》，其目錄反映了白樂賈的精選標準及多種興趣。

值得瀏覽一下目錄。

珍本繁多：1489年版的聖奧古斯丁著《神城》，1688年版的安文思著《新中國歷史》，奧爾塔·德·加爾西亞所著《印度香藥談》的1682年的意大利文版本。

還包括數百冊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特別是日本擴張的專著。

報紙收集也是非常重要的：有澳門報紙（《澳門之聲》、《澳門論壇報》、《澳門消息日報》、《團結》及《復興雜誌》）、香港報紙（《士蔑報》、《南華早報》及《公教報》）及葡萄牙報紙（《波爾圖商報》、《消息日報》、《正月初一報》及《世紀報》）及其他：（《在華葡萄牙人》、《盎格魯人-葡萄牙人報》、《亞洲學生報》及《德臣西報》）。

藏畫類，值得一提是斯米爾諾夫、錢那利、福斯托·桑帕約、馬爾西亞諾·巴蒂斯塔、喬治·韋斯特和查爾斯·史密斯的作品。

還有葡萄牙、澳門、香港、廣州、南京和北京的老地圖。

所有這些豐富的信息是太重要了，不容忽視，但現在未充分利用或使人忘卻了他的主人。

香港《南華早報》在他逝世的消息裏提到了一些鮮為人知的活動和方面：“居澳期間，白樂賈是數個總督的非正式顧問，尤其是為澳門和香港政府之間的關係提供諮詢。他是路透社和《南華早報》的通訊員。知之甚少是，他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為盟軍所做的工作。在澳門，他是數個情報機關之間的聯絡官，包括中國政府和支援英國軍隊的團體。他負責香港、澳門、重慶和在敵後的盟軍無線電台之間的情報轉接工作。”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需要時間娓娓道來。

1993年，澳門政府通過文化司署、澳門歷史檔案館和中央圖書館舉辦了紀念活動。在市政廳圖書館舉辦了白樂賈生平圖片展。但給人感覺是，未在可利用的時間內，盡一切可能或做應該做的事情，尤其是在象徵的層面。因此，人們不可避免將此和對所做的一切做個比較。這誠然很好。

自1965年以來，白樂賈是葡萄牙國際文化科學院通訊院士。英國王室於1950年授予他“聖詹姆士騎士團勳章”。葡萄牙政府追授他“殷皇子勳章”。

五、若澤·多斯·桑托斯·費雷拉

若澤·多斯·桑托斯·費雷拉（1919-1993），朋友稱它為“阿德”。是他通過“澳門基督教語言”發揚廣大了土生葡人的藝術、工藝和從文學角度謳歌了土生葡人的靈魂而被讚譽。他說：“當時，純的土生葡人彼此溝通不用使用漢語或其他語言，可又無人教授他們祖國的語言。可以相信，他們努力維護調整自己的口語和書面語的規則。毫無疑問，多少年來，雖困難重重，還是保留了下來，直至出現了第一批老師向他們開始教具有良好語法和正確發音的葡萄牙語。”

通過一種簡單，且直接的方式，阿德指出了幾代人的缺失，無學校、無教學、無葡萄牙語的傳播。負責的神職人員和首批王室教員已抱怨正式教學的匱乏。顯然，聖若瑟修院傳播的文化和語言教育非人人可及。

其他方面，他也做了不少“課外功課”。1978年，他自費出版了《澳語：簡要比較語法及詞彙。澳門方言》。

然而，沒有“葡萄牙文人”的痕跡。該詞組的意思恰恰是“一個刻意講標準葡萄牙語的人，發音矯揉造作。”

這首從《澳門：福園》中摘選的四言詩值得品味：

澳門乃基督徒之家，
 葡萄牙人把它建立；
 眾人安居樂業於此，
 心中充滿神聖信仰。

通過這一詩句，人們可以窺測倫理和道德的價值觀，令我們巧妙地想起了這個“城邦國”天主教文化的傳教性和基督性。它沒有忘記對民衆的教誨和對異性價值的提升。

在《瑪麗亞與若昂少尉的故事》的“卡米洛式”的情節介紹中，阿德強調了這些價值觀：“是我們無憂無慮童年的夢幻之地。澳門善良而美麗，是多少代無比忠誠而崇高的澳門人的驕傲。他們永志不忘他們的葡萄牙國籍。使用著這個得天獨厚的古老方言使得澳門得以延續。為葡萄牙帶來榮耀，謳歌葡萄牙。熱愛澳門使我們更加熱愛這塊神聖的土地。”

詩中不乏淡淡的優雅與幽默，不因冗長而失色：

偉大的詩聖賈梅士，
 若健在，會來澳門。
 一望鬱鬱蔥蔥，
 憐惜衆多詩人，

會睜開那失明的單眼，

看看此地真是澳門。

在話劇小品《奇科上學校》中，我們看到，這個學校的老問題依然存在。它竟然成為一個發揮和重新創造一種表達感情和秘密的特別語言，表達自豪感和肯定自我的機會。它是很暗淡無彩的，可對廣東話而言，它又是足以自傲的。

是字詞分開了血液融合之物。

阿德的工作的確很神奇。應該這樣說，應該承認它。他幫助了這種含糊不清的混合語，不僅僅賦予了它使用概念、語法和詞彙，更主要的是給了它文學創作，重溫熟悉的家庭環境和都市神話。以此阻止了虛無主義的空虛，與此同時，土生社團使用這種語溝通贏得了它本身的堅實性。可它還是被不應該得到的命運壓成了齏粉。

重新體驗是重塑語言，如記憶的舊血管中流淌著新鮮的血液。它灌溉著過去，使它獲得新生。

後來，白姐麗對土生葡人的方言作了精湛的研究。

在土生葡人詞彙中，有“妹仔”（過去和現在這個字都有貶義）一詞。它具有一個地方文化人類學的意義，而且聽上去有一種美妙與可理解的發音。不經這麼解釋，還知不知道它的含義是：“這是給一個被父母賣給或送給別人，對接受他的人絕對服從的中國姑娘起的名字。”這不尋常的故事繼續有下文。在澳門土生葡人方言中，它是一個貶義詞。湊巧講一件發生在一位上海的澳門土生太太和里斯本一警察之間的事情。據說是在里斯本。女士在等車，但沒排隊，試圖加塞。此時過來了一位警察，對她說道：“夫人，請排隊！排隊！”。那位女士以為受到了侮辱，憤慨地回答道：“我是妹仔？你敢叫我妹仔？你才是阿仔！”

若澤·多斯·桑托斯·費雷拉圖深受大家的愛戴。曾任澳門利宵中學秘書處的負責人、澳門省體育教育委員會、仁慈堂值理、曲棍球俱樂部、澳門足球協會和扶輪社主席。

他被授予“殷皇子勳章”和澳門政府頒發文化功績勳章。一處公園內有一尊若澤·多斯·桑托斯·費雷拉的雕像。這意味著他為澳門文化身份認同所做出的努力、創造性、道德和公民性質的服務受到了社會的承認。

在由馬查度作序和由巴路士插圖的《陳卓你好》這本書中，字裏行間，我們看到“澳門魂的故事”。

啊澳門，葡萄牙的花園，
世界一偶散發播種的芬芳，
你無比忠誠！

他在本澳媒體上留下了許多署名文章並參加了無數次的話劇演出、音樂會，小歌劇和電臺節目，提高了“澳語”的地位。

下面為他的主要作品：《斯堪的納維亞；風情萬千》（1960年）、《澳門便是如此》（1968年）、《檯球與慈善》（1982年），《賈梅士：民族偉人》（1982年），《澳門詩》（1983年）、《瑪麗亞與若昂少尉的故事》（1987年）和《澳語詩》（1992年）。在馬查度主編下，澳門基金會出版了《若澤·多斯·桑托斯·費雷拉全集》，從而使這一重要的文化遺產普及至大眾。